

(acculturation mode)，他们很少有人实现整合和同化，更多的处于分离境地，少数彻底被边缘化。

成为特定政治体的合法成员获得公民资格，主要有三种原则：出生地原则、血统原则（依从于其父母的公民资格）和归化原则（naturalization）。中国公民权的获得，主要是血统原则。

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也就是获得公民资格（citizenship）、享受公民权利、建构公民认同（citizen identity）并培育公民德行（citizen virtue）的过程。公民资格的获得，和公民权密切相伴，其背后有不停息的斗争和话语实践，以追求承认、平等和平权。在马歇尔三位一体公民权（法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基础上，雅诺斯基和格兰在《公民权研究手册》中细致勾画了当代公民权的范围/维度：法律权利、政治权利、社会权利和参与权利，每个类别之下，还有更详尽的亚范畴。

这片土地上的同胞，逻辑上都是共和国政治体中的平等成员，他们都具有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尊严、自由和权益。他们也应该拥有平等的完备公民权。但就中国今天的情形而言，我们发现公民权这种群体资格呈现出梯度特征，即非公民权（no citizenship）—部分公民权（partial citizenship）—完备公民权（full citizenship）。其缘由关涉承认政治学。

泰勒指出，在以性别、族群、宗教甚至出生地来对人群进行划界的过程中，底层群体被优势群体污名标定，其特异性要么被忽视，要么被贬低而排斥。这是有意的错误承认（misrecognition）或不承认（nonrecognition）的过程。而承认政治就是在建构“本真性”（authenticity）基础上

中国体验的两重性

□冯婷，浙江省委党校社会学文化学教研部副教授、博士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曾经说：如果一个古希腊人神奇地穿越时空来到1750年的英格兰，他或她会发现许多东西似曾相识；但如果他在此后两个世纪才降临英格兰，就会感到自己来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因为他或她在那里能够识别和理解的东西少之又少。诺斯的这番话形象而生动地说明了西方社会自18世纪中叶以后所经历的脱胎换骨般的变革。但不能不让人感慨万千的是，西方社会在200多年中所经历的巨大而深刻的变革，中国在过去短短30多年的时间中，也即在一代人的身上就经历了。这种急剧迅猛、巨大深刻的变迁带给中国人对于这个变革时代的那种错愕迷茫、五味杂陈，既有欣喜、又有痛切的体验，恐怕只有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描述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段话才可表达：“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这是最好的时代。30多年前，我们怀着对现状的厌



倦、对未来的憧憬主动追求变革。我们厌倦了一成不变，厌倦了经济的贫困和生活的贫乏，厌倦了折腾人而又毫无新意的各种运动，厌倦了一件意识形态的道袍盖住一切文化、束住所有人的思想和心灵的状况。于是，人们求变，甚至在不少人的心中隐隐约约地觉得：哪怕变得不尽如人意，也要比一成不变强。因此，在变革之初，变迁本身就带给人们一种正面的、积极的感受。更何况，随后30多年的变革也确实带来了许多正面的、积极的变化，从而带给人们许多以前没有体验过的美好感受。人们的腰包比过去鼓了，市场上的商品比往日丰富了；束缚越来越少，选择越来越多；八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早已成了历史记忆，代之而起的是让人目不暇接的荧屏银幕；书店里再也不是冷冷清清只有那么几本让人一看就厌的书，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观点、不同品位的出版物；意识形态日趋宽松……所有这一切，都带给人们前所未有的兴奋和快乐。

但这只是一面，变迁也带来了许许多多消极、阴暗、痛切的感受。我们是不再像以前那样贫穷了，但愈演愈烈的贫富分化不断地折磨着人们的心理承受力，催生着人际间、群际间越来越重的嫉妒怨恨；行动是越来越自由了，但在束缚减少的同时，我们也越来越难以得到来自组织、群体（共同体）、他人的同情、保护，更不用说关爱了；文化表面上是比以前繁荣丰富了，但人们的精神、心灵却比以前更加空虚无依，除了物质性的占有、感官上的快乐，我们不知道还可以追求什么。与此相对应的则是黄毒赌的空前泛滥和道德底线的几近崩溃；政治的神经是不必像以前那样时时紧绷了，但被揭露出来的官场腐败却越来越令人触目惊心，而且，揭露得越多越严重，人们就越相信没有揭露出来的也越多越严重……如此这般，使得人们在感受变迁带来的种种实惠、乐趣的同时，心中也充斥着愤懑、怨恨、焦躁、苦闷、迷茫乃至绝望。兴奋与压抑、希望与失望、欣喜与沉痛、轻松与焦虑、昂扬与消沉、冲动与疑虑、笑声与骂声彼此交织在一起。因此，若问这个时代的心理基调是什么，不是单独的哪一种情感或哪一面体验，而是这些相互矛盾冲突的情感体验的交织杂糅，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心理基调。

由变迁带来的中国社会在心理体验上的这种两重性，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体验的阶层分化，即所谓体验的正反两重性，实际上乃是体验的阶层分殊性：在变迁中相对获益的社会中上层成员主要体验到的是“变迁之乐”，而在社会变迁中相对受剥夺的下层成员体验到的则主要是“变迁之痛”。不能否认，由于在社会变迁发展的进程中，社会成员在分担发展成本、分享发展成果上存在不公平甚至是严重不公平，社会成员在心理体验上的阶层分化是无可置疑的客观存在。下层成员无疑更多地体验到变迁之痛，从而在他们中间也郁积着更多的诸如愤懑、怨恨等消极、

敌意的情绪。但是，在看到不同心理体验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这种分化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某些心理体验，特别是一些消极负面的心理体验在各阶层之间的“弥散性”。这不仅仅是因为变迁所带来的那些消极的后果，如人情冷漠、道德滑坡、价值虚无、极端功利主义乃至环境污染等，是所有社会成员都回避不了的；而且也因为，在社会变迁进程中不同的社会成员之客观的得失和地位变化，与他们对这种得失变化的主观体验、评价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否则，我们只要按照化约论的立场，仅仅研究客观的阶层关系就可以推断不同阶层的体验，从而也就失去了研究“中国体验”的独立意义了。）据《人民论坛》（2010/12/上，总第310期）杂志的一次调查，在今日中国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剥夺、受伤害者，这集中体现在普遍蔓延的“弱势”心态或者说“自我弱势想象”中。调查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党政干部受访者达45.1%，公司白领受访者达57.8%，知识分子（主要是高校、科研、文化机构职员）受访者达55.4。而网络调查则显示，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的高达七成。

应该承认，在任何社会转型变迁的大时代，都会产生彼此矛盾冲突的情感体验交织杂糅的现象，从而使人们产生种种不适或社会心理的失调。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变迁带给当今国人的不适应，带给今日中国社会心理的失调，似乎特别巨大、特别突出，这只要稍稍去看一下当下中国的网络舆情就可明了。而之所以如此，原因固然与中国人的心理传统（如不患寡患不均、缺乏普遍主义精神、政治文化中的精英主义等），中国的体制结构（如权力集中导致反应迟钝等）多种因素有关；但有两个属于变迁本身的因素在此不能不提：一是特定的变迁模式，二是变迁本身的急剧性。

中国的变迁模式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它是由自觉的改革推动的，因而变迁本身是自觉追求的目标；其二，推动变迁的改革是缺乏顶层设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式改革。这两个特点都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变迁过程中社会心理的失调。由于变迁本身是自觉追求的目标，因而人们对于变迁也就寄予更加美好的希望，许多在（西方历史上）自然自发的变迁过程中产生的经验性事物（如市民社会），在我们这里常常成为主动追求的规范性价值目标。于是，当变迁不可避免地带着它的正反双重后果，当曾经的规范性价值目标在真正成为经验性现实时却带着与期望相反的另一面，那一刻，人们对此的失望和不适应，就要远远超过本来并不对变迁抱过高的期望而只是自然地置身于其中的人们。而由于推动变迁的改革又是缺乏顶层设计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式改革，于是，一方面我们的变革免不了更多更频繁的磕磕碰碰、社会创伤；另一方面，我们也缺乏防护、医治这种创伤的良好配套措施

和制度。

导致变迁带给我们的两重性体验特别强烈，进而使我国社会心理失调特别突出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将西方社会 200 多年中所发生的变迁浓缩于短短 30 年之中的变迁本身的急剧性。试想，如果两个人或两个家庭之间悬殊的贫富差距是在好几代人的历史中渐渐累积而成的，那么，一方面，当事人的双方本身就容易接受这种在不知不觉的渐变中形成的差距；另一方面，社会也可以在较长时间段中比较从容地培育起相关的价值共识，引导人们适应这种现实。但是，假如双方之间悬殊的差距是发生于一代人的身上，那么，有可能使双方适应这种变化、接受这种现实的两方面的条件就都难以存在了。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就像并不只是那些下层成员才体验到变迁之痛一样，在这种急剧的变迁中产生强烈不适的也不仅仅限于那些遭受相对剥夺的底层群体，它同样发生在那些突然上升的群体中。在分析所谓“失范式”自杀时，涂尔干就曾指出，在骤然的经济高涨和突然的经济危机时，都会出现自杀率上升的现象。这是因为，作为社会成员，人的正常生活必须有一定的共同价值和道德规范的约束和引导，而无论是突发的经济危机还是骤然的经济高涨，都会打乱现有的社会秩序，使原有的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对社会成员失去约束和引导作用，进而使他们陷入迷茫和不知所措。就此而言，突然的暴富与突然的贫困一样，突然的地位上升与突然的地位下降一样，突然的自由和突然的禁锢一样，狂喜与大悲一样，都会使、也都意味着当事人脱离原先习惯的行为轨道、生活方式，失去原有价值准则、道德规范的约束和引导，而新的共同价值准则、道德规范在仓促之间根本来不及形成，于是，各种程度不等的不适感（进而导致各种程度不等的行为错失和越轨）就应运而生。

当然，急剧的变迁已经发生，我们无法取消这种变迁，我们不能像对疾驰的汽车那样对中国说：“中国，停一停，我要下车！”我们描述分析变迁之乐和变迁之痛，无非是为了正视那些彼此矛盾冲突的情感体验的交织杂糅所引起的社会心理失调，并提醒采取措施努力消除至少是减轻这种失调——这是社会和谐的心理基础，也是当今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一环。而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无非有三：第一，调整政策，完善体制，强化顶层设计，尽可能地控制未来的变迁，使其向更合理、更公平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要通过制度的变革，扩大普通公民对于影响变迁的重大事务的切实有效的参与，提高他们对于社会变迁进而对于自身命运的控制感。第二，在文化建设领域中，戒除各种浮躁的、急功近利的或阿谀逢迎的心态，以极大的耐心、坚韧的意志，确立人们在这个多元分化的世界中尚保留的共同身份（我认为核心应该是“公民身份”），重塑共同价值观和道德准则，使这种价值观和道德

对于人们的行为、欲望、认识、体验发挥约束、引导、参照和规范的作用。第三，加强心理疏导，消除和化解各种消极阴暗心理，为此，迫切需要建立和健全各种社会心理疏导机制，也就是社会学家科塞所说的“社会安全阀”。

转型时代“中国体验”视域下的社会心态

□沈晖，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博士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并于 2010 年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 10 年来中国抓住了国际形势变化所带来的特殊历史机遇，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大飞跃，本应无可厚非。然而，或许是我们成功的心情过于“迫切”，这种人为推动的经济大幅增长实际上造成了社会各个方面发展的不平衡和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如食品安全、腐败、贫富差距、房价、物价、环保、强拆、下岗失业、犯罪等，这些社会问题反映出当前贫富分化加剧、官民冲突加剧、社会矛盾加剧的状况。不仅如此，近几年社会上还出现了一些奇怪的、令人困惑而费解的现象，如原本应该最为亲密和谐的亲子关系、师生关系、医患关系，却常常演化成反目成仇、恶行相向的人间悲剧；原本应该是社会美德的见义勇为、舍己为人、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却变成令人困惑的、需要引发全民大讨论“该救，还是不该救”的话题……可见，社会问题已经从原来的经济物质层面（利益冲突）向人们的道德伦理层面（价值冲突）扩散，其凸显出当前整个社会面临着极为严重的道德失范和教育危机等。



社会问题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晴雨表”。与其说，它反映了我们在经济建设或者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不如说它是转型时代国人社会心态的投射，反映了国人在改革开放中一种不平凡的经历和体验。社会问题与社会心态相互交织，相互酝酿。我们不难发现，伴随着各种社会问题的涌现，一些茫然的、无奈的、怨恨的情绪在社会上蔓延，国人社会心态开始出现某种不健康的症候。

学术界与网络媒体对当前社会心态的论述，主要有四种观点：焦虑论、弱势论、浮躁论、仇恨论。焦虑论者认为，当前社会大众普遍存在焦虑心态，如就业焦虑、身份焦虑、财富焦虑、婚姻焦虑……人们发现自己的目标和结果之间存在永恒的背离，且找不到由此及彼的通道，内心的焦虑感因而不断加剧，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焦虑传递。弱势论者认为，当前社会大众蔓延着一种普遍的弱势心态，无论是扛着编织袋进城的农民工、吃低保的城市贫民、拿着简历在职场奔走的大学生，还是月收入上万的白